

論壇：學術「國際化」的得與失

三、來自美國的觀點—以政治學為考察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美國社會科學學門中 台灣研究的縱覽

作者 鄭敦仁

美國威廉瑪莉學院政府系教授

美國亞洲評論主編

翻譯 陳鴻章

政治大學政研所碩士班

——次戰後的第一個三十年間，美國社會科學中，台灣研究是罕見的，隨後的二十年，台灣研究的興起，如流星般的迅速，且在新千禧年的拂曉已有良好的根基與普遍的認可。不論是國外或台灣學者的作品，今日的台灣研究，在研究主題及研究方法上和社會科學都有良好的連結。在這篇短文中我將對於台灣研究，在美國社會科學學門的定位，進行一些個人的初步觀察。這一個觀察主要集中在政治科學，並略為涉及社會學、發展研究及經濟學。在整個台灣研究發展的敘述上，是以年代為主配合呈現三個台灣研究的成長階段，以其研究題材的變化進行探討。當然某些論文將被引述為例證，但這並不代表我嘗試挑選出這個領域中的主要著作，因為不論是在台灣或國外，許多研究及著名的學者是被認可的，若要進行評述需要更大的篇幅。



(一) 隱匿的台灣： 在學界邊際的島國

二次戰後的二十至三十年間，在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SRC）的支持下，現代化理論家成為社會科學中的主流。隨前殖民地地區新興國家的迅速誕生，在政治自主及國家獨立後，現代化成為下一個被追尋的崇高目標。這個經驗世界的新事實，引起這一時期的學者開始尋求理論的普遍化，為了建立現代化過程的普遍原理，所以進行深入田野調查，來驗證理論。例如，亞洲已現代化成功的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日本、現代化中的泰國、非洲的迦納、中東的土耳其，皆同樣受到現代化學者的關注，但諷刺的是日本及泰國是非西方地區中，唯一逃過被殖民命運的國家。

雖然，共產中國不是被SSRC刻意挑選的對象，但卻為社會科學家普遍地投入時間及精力，進行研究的社會與政體。共產中國帶有劇烈社會劇變，及強烈意識形態進程的現代化路徑，和由上而下改革、實用主義的明治日本形成強烈的對比。明治維新與中國革命的比較，是一個普遍受歡迎的獵物，而印度和中國經濟發展的比較，同樣受到經濟學家喜愛。對前衛的社會學家而言，中國行為模式和西方行為模式，是一個鮮明且嶄新的對比，如 Franz Schurman 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的研究即是最好的例子。而在外交政策、國際安全次領域的學者方面，共產中國被視為是一個鐵幕後的封閉國家、冷戰時期西方的對手，及不結盟運動的推手，研究共產中國是知己知彼的必要課題。

在長期的現代化典範的陰影及中國研究的繁盛下，社會科學家對台灣研究幾乎沒有熱情。即使是在政策制定的觀點下，也幾乎沒有興趣與動機對台灣進行研究。終究，多數對台灣的理解，視台灣為一個受美援影響的美國附庸國家。

台灣並不是研究的主體，是一個中國研究中的枝節問題，或美國與亞洲關係中的一個問題。因此我們可以充分的了解，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二十至三十年間，絕大多數來自台灣在美國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研究生，其學位論文是以中國大陸為主題，而不是以台灣為主題。且日後，是以其在中國方面的專業知識，活躍於美國各大學院校。

此一時期重要的台灣研究，主要是關於台灣如何運用國外援助、商業組織、政權型態等，但這些研究並沒有在學術世界引起重視。相關的研究例如 Neil Jacoby 慎重的檢視美國對台灣社會，在物質基礎援助的流動模式及影響，但其研究在發表之初，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Robert Silin 開創性的台灣商業組織研究，同樣是孤寂的，Gary Hamilton及其門徒在二十年後才投入這場論戰。而戴鴻超 (Hung-chao Tai) 則是從事土地改革政治、地方選舉與政治壓制間的緊張狀態研究。但在 Juan Linz 清楚的建構威權主義，且成功的挑戰極權與民主的二分政體分類之前，關於台灣政治統治的研究，並沒有真實理解台灣的政體。

在分裂國家典範上，台灣研究有稍微明顯的描繪。分裂國家研究，是一個冷戰的產物，其以東西德、南北韓、南北越南、兩個中國間的互動，探討分裂國

家內的發展。即使分裂國家的研究未曾興盛亦未曾消失，然而其並未真實地成為一個主要的研究問題。且在任何的個案中，雖然沒有完全對稱的分裂國家，但台灣與中國大陸這一個案例，並未如東西德、南北韓一樣，能真實地相互匹敵，因此，兩個中國在分裂國家研究中，是最少被研究的。

(二) 高能見度的台灣： 新興工業國家及不尋常的民主

經濟將台灣研究推向一個空前的高點，於一九八零年代，台灣不但有非凡的工業出口，同時有著低度的所得差異，在東亞以卓越新興工業國的姿態出現。此一時期，台灣研究以幾近兩位數的比率成長，而台灣的發展經驗，形成了一個新興工業國家研究上的新概念類別，尤其是對於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研究領域而言。同時，台灣研究自成一格並和中國大陸研究脫鉤，台灣政治經濟被有系統地和南韓進行比較，且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發展，亦總是被引用來和拉丁美洲新興工業國家對照，其中又以台灣及南韓是兩個最常被引用的例子。但諷刺的是，當台灣研究開始飛躍的同時，卻因美國以台灣利益為代價，尋求和中國大陸聯合對抗蘇聯，而使台灣的國際地位降到最低點（參見James Mann與Robert Sutter的評析）。

那麼，什麼是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研究的知識脈絡呢？答案是依賴典範的式微。依賴理論觀點創始於拉丁美洲，並向非洲輸出，但卻因東亞的經驗證明其理論預測的錯誤而備受批評。即使如Peter Evans將原本的依賴理論修正為依賴發展，依然無法解釋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經驗的謎。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發展較晚，但卻有持續的高度經濟成長、良好的所得分配、低通貨膨脹、較少的社會階級化、且台灣幾乎沒有外債。相對的，發展較早的拉丁美洲新興工業國家，呈現停滯並於一九八零年代陷入长期的外債危機。更為深刻的問題是，為何東亞新興工業國家是溫和的發展導向威權政體，但拉丁美洲新興工業國家，卻是有害的掠奪性威權政體呢？

Chalmers Johnson是解答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經驗之謎的領導者，其在通商產業省（MITI）與《日本奇蹟》一書的最後一章指出，台灣和韓國都是日本式的發展型國家，有別於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管理型國家及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型國家的國家菁英，不僅是進行單純的管理或以意識形態取代市場中的私部門，而且在威權主義的保護殼下，被賦予管理或取代市場中私部門的能力。Robert Wade以台灣為典型的案例來說明國家如何指導市場的運作。Stephan Haggard進行最廣泛的東亞與拉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丁美洲策略的比較。Peter Evans 則是說明威權主義的韓國及台灣，如何進行非洲的札伊爾及巴西都無法達成的公私部門連結與經濟轉換。Gary Gereffi & Don Wyman 編輯了 *Manufacturing Miracles* 一書，並譯成中文及韓文。在此著作中，台灣及韓國被系統化地比較，同時，高度經濟成長年度的政治變遷過程亦被對照。Gary Hamilton 等人提出了網絡資本主義體系，並對日本、韓國及台灣進行了徹底的研究。最後，當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對日本、韓國及台灣的制度及成長，進行一系列的研究時，世界銀行也開始找尋東亞成就的制度基礎及政策內容。

以上所提及的研究及其他相關的新興工業國家或台灣的研究，有三個明顯而值得一提的特色。首先，台灣幾乎在所有區域間、區域內的新興工業國家研究上，被當成追逐的典型。所以，在絕大多數研究讚許台灣發展過程的情況下，台灣已不需要自我推銷。其次，這些研究採用歷史制度論途徑及路徑依賴分析，企圖解開政府如何有效引導市場，及制定良好政策的制度基礎。以這些新的研究途徑，研究政治經濟和第三世界發展，主要是回溯制度架構的起源與發展。最後，有關新興工業國家的主要研究，皆是由政治經濟學及社會學的學者所進行的。同時，台灣是一個首要被解

答的謎，亦是一個主要學者不可能放棄的理論發展案例。

於一九八零年代後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衝擊亞洲地區，並為台灣研究進一步注入原動力。第三波民主轉型起始於一九七零年代的南歐地區，並於一九八零年代初擴散至拉丁美洲，於一九八零年代晚期衝擊東歐，同時造成全面性大規模的民主轉型。然而亞洲地區並非如此，亞洲民主運動有成有敗，目前該地區民主與非民主國家的數目是相當的。因此，研究民主轉型的學者，被亞洲地區成敗交錯多樣的民主運動結果所吸引。在這個新的研究領域中，台灣再一次成為最顯著的案例。台灣不僅是新興民主化亞洲的一部分，同時其民主化過程也相當不尋常。其威權時代的執政黨在緩進的民主化過程中未曾失權，政治韌性與墨西哥的制度革命黨相當，已略具長期主導民主過程的實力，頗具以色列勞工黨、日本自民黨、瑞典社民黨及義大利基民黨的威勢。研究民主轉型的學者，迅速關注到台灣民主轉型中，許多非常態的情況，例如，低社會成本的民主轉型，及轉型過程中持續存在的國家認同問題。

由於台灣研究獨創性的崛起，使得來美國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台灣學生，全力投入台灣政治經濟的發展與民主的變

遷的研究，或將台灣含括在其比較研究中，而只有少數學生研究中國大陸。此外，這時期的莘莘學子將台灣置於理論的或比較的觀點，此不僅具有學術的意義，同時亦是生涯的希望。純粹的台灣專家幾乎沒有機會通過任期檢驗，必須是一個以台灣為案例為研究對象而專攻民主轉型的學者、政治經濟學者或是方法論學者，才能在美國的高等教育機構開拓學術生涯。

（三）台灣研究日漸成熟

台灣研究在經歷了二十年的擴充後，似乎失去了些許的朝氣，且在世紀交替的時刻，再一次和中國研究連結。當台灣令人驚奇的發展與民主轉型之謎，逐漸獲得解答後，台灣已不再是一個迷人的研究主題。當台灣的新興民主被鞏固，對台灣民主的研究轉向選舉的過程的研究。Peter Odegard 在一九九八年美國政治學年會台灣研究小組會議中，對台灣研究所提出的評註是深具啟發性的。他指出：在台灣，選舉行為已是正常民主過程的一部分，且我們可以在其他如美國這樣的穩固民主國家發現相同的結果時，台灣的選舉行為研究已無法如以往那樣讓他興奮。

此外，有強烈吸引力的中國研究領域，開始衝擊台灣研究的學術社群。過

去二十年間，中國大陸在缺乏重大政治制度轉變的情況下，創造了驚人的經濟發展。中國大陸已成為一個吸引優秀學者投入的新課題。更甚者，越來越多對於中國大陸的研究計畫被執行，而台灣研究似乎被整合入中國研究的一部份。例如，對於台灣選舉過程的研究，並非完全是為了台灣本身，而是為了更了解兩岸關係的變遷過程，或者是否為中國大陸可能變遷的原因之一。諷刺的是，在一九九〇年代後期，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但卻由於中國的導彈威脅，提高台灣的國際地位與聲譽。此時台灣研究的發展，卻出現一種減緩的情況，甚至於有蕭條的跡象。

台灣研究如果呈現蕭條，那可能只是表象。雖然台灣研究的熱情有些許降溫，但其興趣仍然是持續的。雖然台灣研究與中國大陸研究有更頻繁的連結，但是雙方擁有各自的學術社群及相當的相互自主性，兩個學術社群間的互動，應可維持互惠、對等的原則。本質上，台灣研究歷經二十多年來的發展，其主力已相當多樣化，且研究方法亦更為純熟。從事台灣研究的學者，至少在四個研究舞台上，不但可以平穩的縱身躍入下一回合的知識研究，甚至可以在跨國研究計劃上，取得領導的地位。

首先，在東亞發展研究上，雖然有關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著作已頗浩瀚，但是學界對於東亞模型的解構、超越狹隘工業政策的界限、對亞洲發展模型更為持平的評估，還存有有著相當強烈的需求。在這些新的學術努力上，台灣再一次具有重要地位。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發展模式並不一致，至少台灣及南韓是兩個已經被確認的次模型，政治經濟學者期待，對台灣及南韓這兩個或其餘的次模型，進行更為精細的描述。例如，在這個次模型下，政策誘因是如何設計的，工業結構如何形成，各界利益如何調和，政策如何管理，全球化挑戰如何克服。此外，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發展的次模式在不同地區，如何受到不同型態國家的重視。是否泰國、墨西哥、肯亞偏好台灣模式，而馬來西亞、巴西、象牙海岸走南韓模式。

政治經濟學者們同時也已經超越以往的關懷，不僅在工業政策是否有益或傷害發展上進行爭論，而且在民主化與全球化的脈絡下，檢視環境管制、社會福利供給、教育及預算制定等政策領域。目前該問的是，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是否跳脫過度發展的北歐社會福利國家陷阱，以不同的方式，設計多樣的代間社會契約呢？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是否有較好的社會微觀基礎，可供緩和鄰避症候群症（the NIMBY syndrome）（編者按：NIMBY, Not In My Back Yard, 「不要在我家後院」。例

如個人或社區反對在自家附近興建某種設施或土地利用所表現出來的態度。）以及支持永續發展？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是否具有良好的宏觀（憲政設計）及微觀（預算條例）的制度，來排除或降低感染民主通病（預算赤字）的機率呢？對於以上提到的問題，台灣可能是典型研究案例，在理論上具有相當的開創力。台灣自然環境的破壞相當徹底，但環保意識格外高漲，防護性的金融保守主義根深柢固，對於福利國（welfare state）的需求極為強勁，可是福利社會（welfare society）的傳統仍然可見。如果台灣無法因應這些新政策所帶來的挑戰，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亦不可能因應的。如果在台灣脈絡下發展的理論命題得不到支持，在其他較輕微的國家案例上也就不能適用了。

在亞洲金融風暴的啟發下，政治經濟學者們也殷切的期待，能對於多樣的東亞模式，有一個更持平、確實、穩固的評估。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前，東亞模式是被稱頌的，尤其是南韓被視為是一個高效能的網絡資本主義典型。但在亞洲金融風暴開始之後，即使某些學者與政治領袖不屈不撓地為東亞模式辯護，但是大多學界與政策界人士毫不留情的，急聲宣告東亞模式的失敗與死亡。然而，當亞洲金融風暴出人意外地迅速結束，那些東亞模式的批判者，如同最初發動批判般迅速地沉寂下來。而台灣在

這場金融風暴中，並沒有遭受嚴重的衝擊，台灣是東亞模式中，明顯不同的案例（中國大陸雖然安然無恙，但大多數專家以為大陸金融體系極其封閉，因而仍未受嚴峻挑戰。）所以，台灣或許是一個可以對東亞模式，進行較為一致且持平評估的實驗室。

其次，台灣研究學者的第二個研究舞台，是新興民主化亞洲的制度與治理方式的研究。有關民主的亞洲的研究，已經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不再如以往關注民主化的起源及過程，而是關注民主轉變的結果。這方面的研究，從事台灣研究的學者，不僅持續的活躍；同時，也是這個研究領域中的研究議題的主導者。由國科會出資，國立政治大學和國立台灣大學等，週期性執行的選舉調查，和中研院所進行的社會意向調查，是廣為人知的。這些調查資料開放的速度與條件長久以來曾備受爭議（社會意向調查資料釋出一向較快），但是其品質是知名的。在海外，台灣總是被包括在主要的調查，和廣泛被使用的跨國資料庫中。例如，密西根大學的世界價值計劃、密西根大學的地方政治菁英計劃、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為主的官僚政治計劃、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為主的選舉體系與選舉計劃，及麻省理工學院為主的政治穩定調查。附帶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台灣被學術聲望極高的跨國

研究計劃所包括，但卻被排除於主要的國際組織之外，這樣的情況確實是相當可悲的。

近年來台灣研究的學者，至少已經在五個跨國研究計劃中，取得領導地位。例如，亞洲選舉體系與選舉的比較研究、經歷霸權政黨統治國家的政黨體系變遷比較研究、亞洲民主價值的跨國調查、四個亞洲新興民主國家（韓台菲泰）的制度設計與民主治理的比較研究。而且，台灣個案研究，例如半總統制體系下的政治結盟、多席次單記非讓度選制下的立法行為、少數族群的策略性投票等，對於比較政治研究文獻也有重要的貢獻。關於探討政黨結盟形成邏輯的早期文獻，是在內閣制體系下進行的。而策略性投票的文獻，則未曾詳論族群因數在選舉選擇上所造成的影響。這些現實性問題的研究，確實將台灣標示在理論性文獻的版圖上。

台灣研究極具潛力的第三平台是，比較勢力不對稱的雙邊關係（asymmetric dyads），這一個未全然被探索的領域上，可能有亮麗的未來。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所存在的持續政治緊張，和日漸加深的經濟互賴，可說創造了一個迅速成長的兩岸關係動態研究。明顯的，海峽兩岸間的雙邊關係，是一個勢力不對稱的國家關係，台灣在人口、土地、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軍隊及經濟上的規模皆是較小的國家，但卻有民主體制及開放的社會；而中國大陸是極為巨大的，且是一個有牢固控制體制的國家。在勢力不對稱的情況下，雙方互動的影響與模式，已成為處於弱勢一方學者的困擾。加拿大及芬蘭的學者，為建構其與美國及前蘇聯的個別聯繫，已經投入數十年的時間，檢視各式各樣的途徑。在這個研究舞台上，兩岸關係和其他勢力不對稱國家（如芬蘭-蘇聯、加拿大-美國、以色列-阿拉伯國家、斯里蘭卡-印度、科威特-伊拉克、現代化以前的日本-王朝時期的中國）的比較，將產生理論性的洞察，且把台灣研究置於另一個分析的面向上。同時，以這一個廣泛比較觀點所作的研究，自有其政策意義。

最後，台灣研究的學者正進入認同政治這個研究領域，在台灣選民的認同分歧、認同變遷方面，已經進行為數眾多的調查，並被分析與理論化。國家認同常常是被塑造的，而非與生俱來的，且不是一種固有狀態，而是一個過程。如同選舉研究一樣，國家認同的研究必須在時間上是連續的。在國家認同研究上，研究者總是能夠期望，以新的調查方法，來發現及解釋。而且，有關台灣的國家認同的研究，可以和美國的政治科學及社會學，找到認同政治文獻的新對話方向。部分新的政治認同文獻，是

被鑲嵌在全球化的論述上。部分新的認同政治文獻，是奠基於一系列對於在九〇年代，自蘇聯帝國獨立的新國家，所進行的一系列跨國研究。這個研究領域中，是由史丹佛大學的 David Laitin 所開拓的。Laitin 和其他參與這個計劃的學者，探究許多和台灣研究相似的問題：蘇聯（或任何帝國）崩解後的新興國家中（successor states），何以有某些團體偏好完全的獨立、某些偏好建立自治區、某些則渴望再次的國家整合？跨時間及跨團體的國家認同的變化，能說明分歧的政治偏好嗎？Laitin 等人已探索若干可能影響這些偏向的解釋，包括理性選擇、經歷高壓統治的倖存、感情等因素。然而，從事台灣認同政治研究的學者，如何和 Laitin 等人進行對話，將是令人期待的。

透過台灣研究在美國社會科學學門發展情況的描述，並進行未來發展願景的勾勒，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研究不但絕對沒有滅絕的危機，而且可說已近乎融入主流社會科學。台灣研究和社會科學學門間的關係，已具有良好的根基。台灣不但是具有激發作用的理論案例，而且是一個良好的測試案例。台灣研究在理論探討、題材篩選與界定、概念架構及研究方法上已臻高度成熟。台灣研究文獻中，博弈理論、交易成本分析，甚至是代理人模型等，已漸獲運用。同

時，台灣研究的檔案紀錄數量，是極令人滿意的。在美國政治學會中台灣研究會議團體（Conference Group Of Taiwan Studies，CGOTS），每年都分到三個場次，這是超過韓國會議組所能獲得的會議數目。而在以往的十五年間，《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這一個國際頂尖學術期刊，共出版了四篇關於台灣發展及政治的論文，且另外有兩篇是高度集中討論台灣及韓國的論文。這份成績單遠超過韓國，而與共產中國的研究打成平手。「世界政治」每期只刊登五篇論文，而世界上共有192個國家，但在此一期刊上，關於台灣的論文數目和中國研究竟是難分高下，誠屬不易。我們可以預期台灣研究將持續地繁盛。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英文的台灣 政治研究

作者 Shelley Rigger
Davidson College

翻譯 陳鴻章

國立政治大學政研所碩士班研究生

在英語系國家的大學中，絕大多數的社會科學學系，都有東亞專家任職。而絕大部分的東亞專家，不論在教學或研究上，皆是以中國及日本為重心；相較之下，只有少數以南韓、台灣、東南亞為研究專長。但諷刺的是，這些較少被研究的國家，反而成為最吸引學者從事比較研究的對象。同時，和這些國家相關的文獻亦迅速地增加。



為了 Issues and Studies 「問題與研究」，此一國關中心所出版的期刊的一個專題。我回顧了超過一百五十冊以上以英文發表，且其題目皆與台灣民主政治有關的書籍、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等。在這些作品之中，絕大多數的書是在1985年後出版、期刊論文和研討會論文是在九零年代中期以後發表的。閱讀這些文獻使我陶醉其中，感到自己學識的有限，並且產生許多個人的見解。

首先，從事台灣研究的政治學者中，大致上可以區分為在台灣出生且接受教育，以及西方國家出生而在大學或大學後接受相關訓練等兩大群體。在這分際之間，不論是在研究方法或研究素材的選擇上，皆呈現相當有趣的差異。在台灣出生且接受教育的學者，不論其是否居住在台灣，可說是從事台灣政治研究學者中，最為強調實證經驗的。相較之下，在西方國家出生且接受訓練的學者，絕大多數被訓練為中國專家，因為投入大量的精力學習中文、中國文化與歷史，所以被定位為區域研究。以上所論及的基本差異，成為此一時期，劃分從事台灣政治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的主要差異。

除了發展背景的基本差異之外，出生在台灣與西方的學者，在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研究資料上，亦有所差異

且表現出不同的優缺點。出生在台灣的學者，多採用量化研究方法，例如選舉的投開票資料及民調資料，且運用假設檢定的研究設計。而出生在西方國家的學者，多採用質化研究方法、訪談及田野調查資料，運用描述性的研究方法。然而，這些研究上的差異，也產生不同的缺失；以出生在西方各國的學者所採取的研究方法與資料而言，主要的缺失及困難就發生在語言與文化詮釋上。對我而言，同樣也面臨如何跨越語言與文化詮釋的難題。另一方面，出生在台灣的學者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也有其缺失。這個缺失即是概念的誤用，換言之，台灣出生的學者要特別小心的是：扭曲台灣經驗的獨特性，硬是套用於一個既存的模型中來解釋台灣的現象。

其次，對於出生在西方各國的學者而言，進行台灣研究的最大挑戰與機會，是西方世界對於台灣在政策制定上，相關訊息的強烈需求。因為台灣在國際關係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美國外交政策上，台灣有更為獨特的地位。也因為如此，造成台灣專家被淹沒於，政策制定者對台灣實際訊息的高度需求中。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專家並沒有餘力從事純理論上的研究；同時，純理論的研究，亦難以發表在學術期刊上。過去十餘年來，主流的英文政治科學期刊，鮮少刊登關於台灣政治研究的論文。反而是，在跨學科的中國

研究期刊中，接受較多關於台灣政治研究的作品。

關於台灣政治的學術性著作，涵蓋相當廣泛的課題，且大多數是世界性比較政治學者，所感到興趣並致力投入的。在台灣政治的研究中，已有許多主題被詳盡地探討，且其研究成果也被廣泛認同；這些主題如台灣經濟奇蹟的政治經濟研究、台灣民主化過程的研究等。除此之外，如台灣的大眾傳播媒體、國家認同、憲政發展、民主鞏固、政黨結盟、投票行為、政策制定等，已經吸引許多學者投入，但仍需要更深入的研究。然而，對我而言，英文的台灣政治研究文獻中，在制度性行為上的研究有明顯的不足，在英文的台灣政治研究中，鮮少探討台灣的立法、行政官僚結構與行為，而台灣的地方政府更是個謎。

總而言之，台灣民主政治在學術上的重要性，不論是在質或量都是令我感到驚艷的。我認為我知道大多數的台灣政治研究的作品，但當我進行台灣政治研究的相關文獻回顧後，我發現許多我不熟悉的研究與作者。這些我不熟悉的文獻，其所呈現的特色是：這些文獻分別被刊登在各種期刊上。我認為：此刻應該是有一個單一的英文學術期刊，熱切地接受台灣社會科學研究的時候。

四、以人類學為考察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台灣人類學發展 之我見

黃應貴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既是科學也是人文學

—— 十世紀初期，人類學的發展是朝——向自然科學的方向前進，當時幾乎所有的人文社會學科，因受自然科學方法的影響，而朝自然科學觀的道路走去。一直到八〇年代初期，才有了大的轉變，因為我們的研究對象是人類本身，但是人類現象有很多並非現代科學目前所能夠理解或處理的，所以才又轉向人文學的方向。

基本上，從目前世界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人類學既是科學，也是人文學，因此在學院歸類時就面臨很矛盾的兩難困境。人類學在台灣大學屬於文學院；在慈濟大學則歸屬於醫學院；而佛光大學的生命科學院裡也有很多人類學家。所以人類學本身在性質上相當曖昧，既是科學又是人文學。

台灣早期人類學的發展，是從大陸延續而來。當時在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

研究所，設有一個人類學組，人類學組的老師基本上奠定了台灣早期人類學發展的基礎。那時候的人類學其實具有濃厚人文色彩。以原住民研究為例，傾向於搶救傳統文化，包括神話與過去的習俗。所以就某個角度來說，它甚至是民俗學的基調，強調人文精神。六〇年代以後，行為科學是整個台灣社會科學的主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更是當時朝向行為科學發展的主要推動者。一直到解嚴以後，整個發展趨勢才又開始朝著既是科學、又同時是人文學的方向改變。

所以，台灣人類學的發展和世界人類學的走向其實是很一致的，目前也都呈現出了內部的歧異性。比如，有的研究利用基因科學探討南島民族起源，這跟現代最尖端的醫學及生物科技銜接在一起；但是也有純粹從理念、民俗、宗教信仰出發的人文研究。這顯現目前人類學內部研究取向的多元化，某些人跟人文藝術結合，某些人又走向社會科學、

行為科學。

但另一方面，一個學科之所以能夠獨立成型，一定是在整個過程中，逐漸發展出自己的知識傳統。而這個知識傳統自然而然會影響後來的學科發展，雖然之後也會不斷創新、尋求新科技、改變原有知識，但是這個改變基本上會受原來知識系統的影響。這是辯證性的變遷過程，不會因為學科內部取徑多元化，就喪失了學科在整個知識系統上的特性和發展的必要，否則這個學科就會消失，因此它仍然保有其基本的關懷和課題。

研究取向的變遷

整體而言，近二十年來台灣人類學的變化相當大。早期人類學的研究幾乎都以人文學、民俗學方式，在搶救、收集研究對象過去的生活習慣。後來為了強調科學，從六〇年代中期開始，非常著重人類學方法論的探討，這時才有了真正的「參與觀察」；可是當時的研究條件還很難突破，往往能夠做兩、三個月的田野調查就非常不容易了。

當時研究的主題也和社會產生較密切關連。人類學開始注意現代化衍生的一些問題，包括工業化、市場經濟的衝擊，或是都市化對台灣農村及原住民社

會的影響。還有一些研究專門討論漢人家族企業的現象，以及漢人家族的特性如何影響企業經營等等。

這些研究到八〇年代面臨了一些瓶頸。人類學和其他社會人文學科最大的差異就是在知識特性上，它是特別強調從被研究者的觀點來看問題，因為被研究者的主觀意識會影響他們對環境的反應方式，這與當時主流的科學主義相互矛盾，所以一直未受重視。到八〇年代解嚴、社會更加開放後，隨著弱勢族群或平民百姓的聲音得以表達，這方面的論點漸漸受到了注意，被研究者的觀點才得以被凸顯出來。

整體來說，六〇年代人類學的發展由行為主義的科學觀所主導，著重行為、社會制度層面；八〇年代以後開始著重被研究者的觀點，所以強調文化層面。但人類學所強調的主觀並不是排除客觀，而是必須注重主觀、也必須注重客觀條件，對現象本身才能有比較完整的掌握。

移植西方知識體系的學術困境

上述與國際人類學發展同步進行的台灣人類學，正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都面臨相同的問題：我們社會科學研究大概都承襲自西方，但我們並不具備瞭解西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方整個理論、文化背景的知識。西方社會科學的發展是在十五、十六世紀，歐洲封建社會沒落、而資本主義社會新秩序尚未建立之時；所以它主要目的是解決社會問題、建立新社會秩序，包括經濟學、政治學都是在這個歷史條件下發展的。可是這個發展過程已經在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的籠罩下，所以社會科學本身隱含很多現代西方文化的觀點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

當我們把這套知識體系搬到台灣社會時，一定會產生移植上的問題，這包括了兩個層面。一方面是我們對這套知識的歷史背景掌握了多少？因為很多理論的預設是基於西方歷史與文化背景而來，而與資本主義意識型態息息相關。學習西方知識的過程中，我們往往只是學到當時最新或最流行的理論觀點，無法對學門的核心知識和精髓有整體性的掌握，所以即使不斷有新的理論觀點出現，可是很少理論觀點會在台灣生根，這是先天上人文社會學科普遍存在的困境。

另一方面，雖然現在的研究條件已經可以進行國外研究，但是大體上台灣社會的現象仍然是主要的研究對象。可是我們對台灣的瞭解有多少？不論從哪一個層面來看都非常的有限，這便侷限了很多研究發展突破的可能性。西方社會

科學的發展，經常倚賴其它學科的支援和研究成果，可是台灣社會科學不但對研究對象本身的瞭解有限，學科與學科之間成果的互動也都很少，所以無法達到學科之間彼此補強的效果。

以我長期研究台灣原住民的情形為例，要真正瞭解原住民的發展，從早期他們原是台灣島上的主人，一直到現在成了弱勢族群，探究整個過程的轉變一定要面對三個歷史條件。第一個歷史背景就是資本主義，台灣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嚴重影響到原住民的發展。十六世紀荷蘭人來台灣時，原住民是當時島上的主人，但是荷蘭人在台灣從事熱帶栽培業，需要投入一批專業生產的工人，導致那些工人無法自己生產糧食。為了解決糧食問題，必須要有人去種水稻，以生產多餘的糧食供工人們食用。可是當時的原住民不會種水稻，特別是平埔族，只會種陸稻，所以荷蘭人從大陸東南沿海召請漢人來台灣種水稻，漢人才逐漸遷移到台灣，而成了原住民的主要競爭者。這整個發展的動力是世界性資本主義力量的拓展，促使荷蘭人想要壟斷東南亞的熱帶栽培業及貿易，可是我們現在往往只著重漢人和原住民的衝突，完全沒有看到其背後的歷史動力和條件，直到今天都還深刻地影響著漢人和原住民。

第二個歷史因素是國家化。荷蘭人統治台灣，其實已經開始帶進現代國家做為後盾，而同時另一方面清朝也是以傳統古代帝國的統治方式來治理台灣。經過日本和國民政府的時代，都涉及了現代國家如何統治台灣、如何將台灣納入體制，從台灣的觀點來看，這就是一個國家化的過程。每個國家化過程的方式都不太一樣，包括語言與歷史的統一等，這些過程會進而影響到原住民族群的文化。比如日據之前是不是真的有卑南族？這相當具有爭議性，因為很多族群分類是政府創造出來以便於統治的。仔細看日本時代對台灣原住民的研究，開始時根本無法確認要分成幾族，現有的分類主要還是國家政治力運作的結果。第三個歷史條件是基督教化。原住民接受基督教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但是並非所有的原住民都面臨了基督宗教的影響。

上述三個歷史條件中，資本主義和國家化，牽涉的相關學科太廣，這是研究台灣社會的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以及人類學家等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可是我們目前對這兩個歷史條件的掌握非常有限，也都無法回答。

學科知識與研究對象的掌握不足

其實我們研究對象本身，並沒有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等這樣的區分。有學科的知識，固然可以幫助我們從某個角度理解現象，但這樣也只能瞭解到一定層面的問題而有其限制。

不過，我們都不是天才，既不是馬克思，也不是韋伯。當研究者一開始便強調跨學科的研究時，所做出來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提不出任何重要的觀點，而只是我們所謂的一般知識。這是一個兩難，我們知道研究對象不應該被學科所分割，但是假如沒有學科的基礎，反而什麼都無法掌握。但若有學科做為支撐基礎的研究，如果可以不斷的進展，不只能夠解決學科知識上的問題和現象本身，同時也可以面對知識上的限制，並且加以突破。學科的存在還是有它的道理。

既然每個學科都有各自的專長和侷限，所以即使發展得再好，到了某個階段還是會遇到瓶頸，需要想辦法再求突破，這時就必須擴張學科領域，因此跨學科是很自然的現象。問題是我之前談的，一般研究者常常無法掌握好本身學科的專業知識，對研究對象的瞭解又不足，兩方面都沒做好，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以社會科學研究為例，有一位已過世的學者陳紹馨先生，他早期是社會和人口學家，對韋伯及黑格爾理論的掌握非常好，可惜牽涉二二八事件，所以在研究上受限比較大。但是很少人像他用畢生的心力在研究台灣，同時又具有深厚的理論基礎。他的研究成果影響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人口學等，不僅能夠提出有系統的觀點，同時幫助我們對研究對象本身，有比較深入而不同的看法。所以，當你愈能夠掌握學科知識，對社會又有足夠深入的瞭解時，就愈容易發揮學科特性，也愈能夠以被研究者的獨特性反過來修正原來的理論觀點，或是提出新的理論。這幾乎是所有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夢想！

可能台灣整體社會人文學術發展還不夠成熟，學術社群本身尚未形成足夠的累積及對知識態度的共識，以為評斷研究好壞的基礎，更不用說上述理想如何實踐。以人類學而言，過去幾十年研究台灣社會，我們到底掌握到台灣社會怎樣的獨特性，而在社會人文學科知識的創造上，有其獨特的貢獻？大部分的人都講不出來。這正顯示我們對西方的知識學問瞭解不夠充分，對自己文化也未有足夠掌握，形成知識上的斷層。比較之下，日本人類學的研究傳統有其可借鏡之處。

日本人類學研究傳統的借鏡

日本社會是師徒制的傳統，由老師來領導學生，所以比較容易有累積性的成果，但過去日本人類學研究成果一直少有與西方或國際人類學研究成果直接對話。一直到九〇年代初，日本已經能對西方人類學理論提出挑戰，其中最有名的是清水昭俊。這位人類學者，他一生都在研究日本的「家」，從家的獨特概念發展出一套親屬理論，繼而質疑現有理論中的文化偏見。但他一開始就很謙虛地承認，這個研究是奠基於日本學界過去七十年的研究累積結果，包括日本傳統學術研究對家的各種看法，以及日本有些學校專精的只投注在某個西方理論的驗證上。這些累積使他得以充分掌握日本家的獨特性與西方各種親屬理論，進而開展出親屬研究的新方向，挑戰已有親屬理論中的西方文化偏見。

相對之下，台灣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術發展就面臨無法累積的問題，很多研究得不到本科及其他相關學科研究累積的支援。這個困境更因每個學者國外進修回國後都從零開始，所以很多號稱台灣第一，最後落入沒有累積的惡性循環中，變成繼續不斷應用國外學的新理論，而這些理論又因為缺少後續的研究及沒能與傳統學問結合而無法在台灣生根。

缺乏累積知識的規範制度

上述無法累積的問題更因台灣社會人文學界各立山頭，彼此之間無法進行對話而更嚴重。這裡又牽涉另外兩個問題。一個主要是台灣並沒有真正的學術社群。西方學術可以累積的重要因素，是有一個學術社群，彼此之間真正在進行對話。另外一個問題是，學術社群可以產生規範，比如創新的定義，或是對知識的基本態度等，這些都必須要有學術社群充分的支持，才能建立規範及產生累積、並從事有意義的創新和發展。

自然科學比較沒有這個問題，它有一套國際通用的標準可以規範和檢視，研究成果可以明顯反應是否具有創新和突破。可是人文社會科學在這方面的規範性很難建立，國科會對創新的討論也延續了很多年，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學術社群，所以很難建立規範和累積。這仍然涉及之前的問題，如果我們對學科沒有一些基本的共識，就很難建立學科內部的對話，使得同一學科內的意見差別都非常大，更不用談學科與學科之間的落差。以人類學為例，我們到國外受訓的背景不同，芝加哥大學、史丹佛大學、柏克萊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等等人類學系，都有他們不同的研究方向，因此我們若對人類學不能有較深入的掌握，就很難形成對話和共識，也很難發

展出長期性共有的研究課題，以為學術研究累積的基礎。

社會科學共同面臨的研究課題

當然，台灣目前學術研究的環境和條件不僅已有顯著改善，一些值得長期研究的共同課題也逐漸浮現。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有些共同課題是在每個學科都必須發展的，只是從不同研究角度切入，關注同一課題，這涉及不同學科如何看待同一歷史脈絡中的相同課題。雖然有其差異存在，但是背後的問題可能是相同的。而這些共同的課題不僅是其他研究課題往往必須面對的，也必須由好幾個學科一起來面對。由於這些共同課題從過去到現在都沒有好好處理，但我們以後在研究上卻又會不斷的碰到，例如前面所提到的資本主義化與國家化的問題。

另一方面，後現代理論對過去研究有很多批判和反省。最主要的批判是社會科學概念本身，充滿資本主義和西方文化或意識型態的影響。比如什麼是經濟？其實我們現在瞭解的經濟是十五、十六世紀以後的觀念，人類早期的經濟概念並不是如此，亞理斯多德講的經濟根本不是這一回事。可是我們已經習以為常，後現代批評這是一種資本主義文化偏見，亦即限制我們思考發展的可能

性。

然而，既知資本主義經濟有它的侷限和問題，因此如何找出資本主義之外的另一種可能，這是很多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心中的理想，更是經濟人類學研究中的核心課題和基本關懷之一。蘇聯垮台之前，大家都還認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有一種可能性，到現在卻幾乎已經瓦解。於是資本主義帶來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的跡象，就像韋伯所用的引喻，人類創造了一個資本主義的鐵籠子將我們自己關起來。因此，資本主義之外的另一種可能，仍成了當前急迫待解決的共同問題之一。但每個學科因知識上的特點不同，認識及解決問題的方式也不同。人類學以異文化的研究為出發點，因此也想從非資本主義經濟的原始社會找到思索資本主義經濟之外的另一種可能之依據。

以我研究的原住民為例，最早也是想幫助他們改善經濟。七〇年代時，我協助他們規劃推動儲蓄互助社、共同運銷、共同購買，希望解決他們經濟上的困境，也希望提升他們的生產收入和生活水準。可是過了兩年，當地人跟我說，你只幫助了有錢人。因為表面上適應成功以後，也使得整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機制，在當地更有效地運作，結果是貧富差距立刻出現，窮人存錢，有

錢人借去再投資，對我而言這個經驗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因為這不是我原來的目的。這時，我才意識到我要面對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解決之道是尋找資本主義之外的另一種可能。除非能夠找到這種可能，否則表現上的改革，只是把大家更快速地推進資本主義的機制，這正是經濟人類學一開始就要處理的問題。但為了瞭解原住民早期的經濟概念，就得先瞭解他們對人、物、空間、時間等分類概念的看法。這也是我現在從事基本文化分類概念研究的原因：只有先瞭解他們文化最核心的概念，才能瞭解原住民現在的經濟概念是如何被建構的，也才知道他們如何去反應。而也只有在回答什麼是經濟的問題後，才有可能去尋找資本主義之外的另一種可能之答案。當然，每個學科對這問題的解答方式各不相同，但真正的答案恐怕必須要結合許多學科一起來尋找才行；可惜在這一方面，我們清楚的看到台灣社會人文科學雖已經有許多進步，卻仍嫌不夠成熟。

本土研究與國際學術社群的接軌

也正因為人類學研究強調在地人的觀點，如此是否會導致研究議題與國際學界的發展趨勢造成隔閡而無法接軌？事實上，一個成功的人類學家不僅由被研究者的觀點著手，以便能對當地文化的

獨特性有所掌握，更必須以此來挑戰已有的一般性理論。所以，國際化與本土化的對立問題，在人類學並不像在其他學科那麼的嚴重。這點，更因研究對象的獨特性，必需經由比較全人類文化的過程來證明而更凸顯。

表面上，人類學家是研究一個民族，甚至只是一個部落，但是人類學家必須將這些研究放到全人類的脈絡下看待，才能彰顯被研究對象的獨特性。假如可以做到這點，成果自然會被全世界人類學家所承認，這就是本土化跟國際化的接軌。但在台灣，做為一個人類學家，很少人思考自己是否具備對全人類文化應有的視野，而這是人類學家最重要的基礎和背景。因此，真正的問題恐怕不在本土化或國際化，而是我們到底能做出什麼品質的研究成果？

至於國際化與本土化爭議所衍生的另一個問題是是否要強調以英文（或其他外文）著作在國際期刊發表，以便容易得到國際學界相關領域學者的討論或意見，以達到國際交流，甚至提昇其在國際學界的知名度等。我相信人類學家都不反對這作法與目的。但另一方面，人類學研究本身也清楚告訴我們，每一種特殊的語言文字之表達方式本身，最能呈現該文化的某些關鍵性特性，而研究課題的選擇與詮釋方式的導向、乃至成

果的累積，處處說明了其為該文化發展的結果，更反映乃至創造了該文化當時的心性。如果以當地文字書寫的人類學著作無法得到當地人的肯定與累積，人類學在當地生根與推廣的可能性，勢必受到嚴重的挫敗與侷限。而日本著重日文著作的份量及生根考量的態度，正可提供我們思考有關問題上的借鏡。終究學術的生根與發展，必須它一開始就能吸引當地一批第一流的人才不可。但若缺少當地語文的重要人類學研究成果、乃至入門著作，如何吸引必要的人才投入？而目前台灣人類學所面臨的人才斷層，勢必是它未來發展上的隱憂。當然，這人才斷層的問題並不能簡單地歸罪於我們缺少足夠必要的優質之中文人類學著作，如何培養及訓練傳承者，更是另一個大問題。

人文社會人才的新傳

如何培養及訓練後學，以達學術的傳薪，實則涉及現役專業人士的素質。我們知道學術研究必須要有一段的沉潛，定下心把學科該掌握的基本知識充分吸收，並對研究領域相關而必要的認識做充分的準備，才能具備突破的條件，否則常常會覺得書到用時方恨少，這是最基本的工作。但台灣開放的結果，學術界也面臨很多引誘力，到外面演講、接活動，能獲得更直接更大的利益，這使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得學術人員很難專注於研究工作，更不可能設法去彌補原來訓練過程中所欠缺的部份。以人類學為例，世界民族誌的基礎是不可少的，但是到底台灣人類學家對世界所有地區的文化特性瞭解有多少？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準備得不夠。我在大學中一直想推動基本民族誌的教育，選出每個文化區代表性的民族誌，凸顯這個地區的文化特性。但是這樣重要的課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單位能開得出來。恐怕許多社會人文學科都面臨同樣的問題。

如果沒有具備寬廣視野、擁有紮實的知識訓練與研究成果的人員，又如何培養出世界一流水準的學術人才來傳薪？又如何能有足夠的累積而有真正的突破？

[本文原名為〈世紀之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樣態——人類學〉原刊於《淡江人文社會學刊(五十週年校慶特刊)》：121-129，2000。後收錄於《人類學的評論》一書中，2002。原文原為訪問稿，本文已刪除原文中訪問者的提問，並針對本期重點作一些小幅度的增修。]

